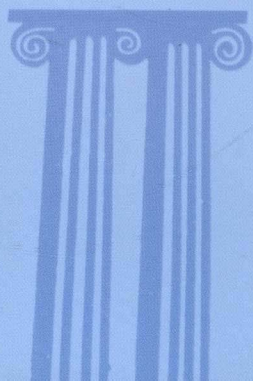


国外哲学发展

年度报告 (2010)

主编 韩震 执行主编 田平

20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外哲学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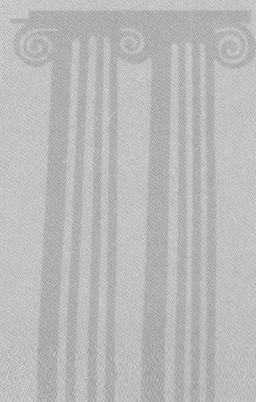
年度报告

(2010)

主编 韩震 执行主编 田平

20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 2010 年卷 / 韩震等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161-1501-5

I. ①国… II. ①韩… III. ①哲学—发展—研究报告—
国外—2010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907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72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

(2010)

主 编 韩 震

本辑执行主编 田 平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卫东	董春雨	韩立新	韩 震
江 怡	李 红	李建会	李绍猛
刘 翔	尚 杰	孙卫民	田 平
王成兵	严春友	余纪元	张百春

目 录

导论	(1)
英美哲学	(7)
德国哲学	(83)
法国哲学	(105)
意大利哲学	(117)
俄国哲学	(131)
日本哲学	(159)
2010 年国外部分哲学文献	(165)
(一) 英语哲学文献	(165)
(一) 英语哲学著作	(165)
(二) 英语哲学杂志主要论文	(221)
Analysis 《分析》	(221)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美国哲学季刊》	(226)
Contemporary Pragmatism 《当代实用主义》	(228)
Episteme 《认识：社会知识论杂志》	(230)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	(232)
Ethics 《伦理学》	(237)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欧洲哲学杂志》	(239)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哲学研究》	(241)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不列颠美学杂志》	(243)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哲学研究杂志》	(245)
Philosophical Studies 《哲学研究》	(246)
Erkenntnis 《认识》	(257)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太平洋哲学季刊》	(261)
Philosophy 《哲学》	(263)

<i>Dialectica</i> 《论辩术》	(265)
<i>Bioethics</i> 《生命伦理学》	(267)
<i>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i> 《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	(272)
<i>Ratio: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alytic Philosophy</i> 《理性: 国际分析哲学杂志》	(273)
<i>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i> 《哲学杂志》	(275)
<i>Noûs</i> 《努斯》	(277)
<i>Mind</i> 《心灵》	(280)
<i>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i> 《国际哲学季刊》	(282)
<i>Mind & Language</i> 《心灵 & 语言》	(284)
<i>Philosophy of Science</i> 《科学哲学》	(285)
<i>The Philosophical Review</i> 《哲学评论》	(289)
<i>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i> 《哲学与现象学研究》	(290)
<i>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i> 《哲学季刊》	(294)
<i>Synthese</i> 《综合》	(296)
(三) 英美大学哲学博士论文	(307)
二 德国哲学文献	(328)
三 法国哲学文献	(329)
四 意大利哲学文献	(330)
五 俄国哲学文献	(332)
六 日本哲学文献	(335)
国外哲学系简介	(337)
一 牛津大学哲学系	(337)
二 纽约大学哲学系	(339)
三 鲁格斯特大学哲学系	(341)
编后记	(343)

导 论

自 2007 年以来,受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委托,我一直领衔承担《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哲学部分的材料搜集和编写工作。几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课题组,在其中田平教授一直发挥着关键的组织者的作用。课题组成员结构合理,除了研究英美哲学的学者之外,也有研究德、法、俄、意、日等国家哲学的学者,同时我们还吸收海外学者为我们提供资料支持和学术指导。几年下来,我们都顺利地完成了教育部交办的任务。从 2009 年起,我们在为《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所写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报告的内容含量,开始编写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出版了《国外哲学发展年度报告(2007—2009)》,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鼓励。为了给大家了解国外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我们决定每年出一本发展报告。

发展报告力求比较系统地关注国外哲学特别是欧美哲学讨论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并试图找出学者之间讨论主题的嬗变。当然,一年之间,思想究竟有哪些显著的变化,这是很难把握的,因而也是不能随意加以概括并概念化的。但是,在讨论的特点和讨论方法的变化之中,我们还是能够有所体悟和把握的。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坚持多年,每年的报告连续地出版本身就构成一个哲学观念探索的历史画卷。这就能够给大家提供方便,学者们可以从这种连续性的追踪中,发现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蛛丝马迹,理解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密切关联。

我们的报告采取国别研究与主题介绍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分别以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和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等主题,展开对英语世界哲学讨论情况的描述,也分别追踪了德、法、俄、意、日哲学论争的足迹。

2010 年,在英语世界,哲学研究仍然持续进行。其中,语言哲学研究仍然占据主流的地位。2010 年英语世界对于语言哲学的研究论文多达百篇,研究专著也有二十多部。语言哲学讨论的主要特点,首先是进行了

多视角和跨领域的研究。无论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结合,还是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结合,都体现了哲学家们考察问题的多角度性。其次,加强了关联性研究。对于两种相关联的哲学理论,应给予调和还是仅坚持其中一方。最后,对困境的研究比较引人注目。当一个哲学理论遭遇到某种特殊的情形时,其标准的解释模式可能会失效,困境由此产生。随着近些年来语言哲学研究的日趋深入和广泛,对于哲学理论中异常情况的研究和探讨才得以可能。

在英语世界,2010年心灵哲学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心身关系问题、知觉哲学、意识问题、自我知识问题和行动哲学等方面。在心身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心理物理实现关系和心理物理还原关系是讨论的热点。在知觉哲学的研究中,关于现象特征的表征论和析取主义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意识问题的研究方面,反对物理主义的一些论证和主观经验的概念引起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在自我知识的方面,对自我知识及其权威性的理解受到关注。行动哲学的讨论,主要涉及行动的因果理论、行动的解释、行动的能动性、行动的意图和矛盾心理等问题。

科学哲学是英美哲学界比较活跃且研究问题繁多的领域。通过汇总从《英国科学哲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生物学与哲学》(*Biology and Philosophy*)以及《综合》(*Synthesis*)等重要的国外学术期刊,我们总共收集到50多篇科学哲学研究的文献,从中基本上可以认识到国外科学哲学研究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主要进展。就一般科学哲学问题而言,有大卫·格拉斯(David H. Glass)在《综合》(2010年10月版)上专门就最优解释与真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论述。科学理论作为科学哲学核心问题之一,有着复杂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可以说得到越来越多科学哲学家的关注。比如说,以构造性自然观为主体的近代科学理论观,结构主义的科学理论观,范·弗拉森语境下的科学理论观等。值得一提的还有塞洛西(Stathis Psillos)的文章《科学实在论:柏拉图主义与唯名论之间》。另外,基于约定论依赖于经验主义者的可接受性条件,以及哥德尔对卡尔纳普约定论的否定性态度,罗伯特·哈德森在《卡尔纳普:宽容原则以及经验主义》中指出,约定论一经采用,就会与其第二套不完整性定理相冲突,但是通过宽容原则,卡尔纳普确实承认了一个经验性要求。所谓宽容原则,就是在逻辑上不存在道德,每一个人都可以按

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建立自身的逻辑以及自己的语言形式。也正是由于经验性的原因,卡尔纳普决定在特定理论论题上保持中立或宽容态度,这也就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旨意。科学实践哲学的目标在于以实践为基础,批判性地对科学观察进行描述和评价,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被普遍地认为是对这一批判的反驳。而梅琳达·费根(Melinda B. Fagan)却认为社会建构论中关注知识确定性的观点实则可能是科学实践批判性知识的基础所在,而反对 SCj 的规范性原因却不可能成为基础性的东西。由此他在《重谈社会建构:认识论和科学实践》一文中指出了一条新路径,就是将社会建构论放置在社会行动理论这一普遍框架之中,这一分析性框架可以用来解释知识内含于科学实践之中。就物理学哲学而言,米歇·比特博尔(Michel Bitbol)在《缺乏基础的下向因果》一文中,从反基础主义的立场探讨了下向因果概念的不足。

2010年,英美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研究,首先有三个政治哲学家受到比较特别的关注。一是2009年谢世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者柯恩(G. A. Cohen, 1941—2009)受到学界的隆重纪念。国际哲学界重要刊物 *The Journal of Ethics* 邀请柯恩的一些生前学友撰文,出了一期柯恩社会主义思想专刊。二是著名经济学家森(Amartya Sen, 1933—)长期研究正义问题,在英美政治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森的正义理论明显可以克服罗尔斯正义论的两个主要缺点:(1)将正义问题定位成首先是人的行为是否正义的问题,就可以突破“基本制度”这个概念的局限性;(2)他能够给出一个更加宽广的对“民主”的定义:民主不仅仅是现代西方人发明的一套多党竞争和定期选举制度;民主首先是一种公共的理性讨论,即通过公开的、和平的相互说服来解决分歧,促成社会合作。三是哲学家拉兹(Joseph Raz, 1939—)多年来致力于“完善主义”(perfectionism)理论的建构,在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都有很大影响。*Ethics* 杂志也用了一期的篇幅,专门探讨拉兹实践理性理论中的价值理论。除了对人物的关注之外,超越传统自由主义与民主理论成为一个热点论题。查尔斯·泰勒等人都参与了这方面的讨论。另外,近年来,元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是麦基(John Mackie)所奠定的“道德错误论”(moral error theory)。作为“道德反实在论”(moral anti-realism)的一种,道德错误论认为,说我们有道德义务、道德责任、道德判断,这就像当初化学家认为有“燃素”一样,是错误的。哈吉(Ishtiyaque Haji)发现,对于

三种道德判断,即责任论(hypological)判断、义务论(deontic)判断和价值论(axiological)判断,人们一般认为前两种与自由意志有关,而价值论的判断,即关于善恶的判断,则不涉及自由意志。哈吉担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决定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正确的,即从根本上说,我们对价值的选择是不自由的。因此,哈吉试图在价值论的层面上确立人的自由。还有,神经科学(neuroscience)近年来的发展,使很多哲学家看到了用经验科学来解决哲学争论的契机。

2010年,实用主义研究在人物研究和哲学史分析及比较研究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深入。杜威和罗蒂的政治哲学维度仍是活跃的研究点,而从自然主义角度分析实用主义立场下的认识论、伦理学的思路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对普特南和詹姆士的心灵哲学的研究在2010年也是很有启发性的话题,知觉、身心关系问题仍是其中主要的讨论点。此外,欧陆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学术亲缘的探究,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比较分析路径的热点所在。

在德国哲学界,康德无疑是长期以来最受学界关注的哲学家。2010年,《德国哲学杂志》推出一组重点文章,致力于讨论康德的批判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实体、自由和体系。这篇文章各有侧重点,分别聚焦于三大批判的核心问题,又构成一种有机互补的、具有“合目的性”的研究。而对黑格尔研究呈现出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黑格尔越来越被视为一位伟大的现代社会理论家,相关的研究领域也由此得以拓展。这特别表现在安德里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教授主编的《黑格尔的国家与文化》中,这本论文集围绕黑格尔的“文化国家”(kulturstaat)概念,对黑格尔国家—文化观念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另一本题为《反思性·同一性·精神——黑格尔作为(后)卢曼主义思想家?》的专著,则提出两个核心论点:一是黑格尔的思想绝不是过时的,相反它能够对当代哲学产生重大贡献;二是卢曼系统理论拥有足够的统摄性,能够反映出黑格尔的思想。对于德国唯心主义的总体研究,2010年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成果。《语言·诗·哲学》是讨论海德格尔与德国唯心主义语言观的专题论文,汇集了安德里亚斯·阿恩特、安东-弗利德里希·科赫(Anton-Friedrich Koch)等著名德国唯心主义研究专家的相关论文。2010年正值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诞辰125周年。在布洛赫的故乡——德国的路得维希港,以布洛赫研究中心(Ernst-Bloch-

Zentrum) 为主, 举行了多种纪念活动, 也发表了许多有关文章。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德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一直是 we 关注德国哲学的重点。首先,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 81 岁高龄的哈贝马斯的文章占据着学术期刊的主要阵地。哈贝马斯始终坚持与美国学界的交流, 并努力开展欧洲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的对话。霍耐特 (Axel Honneth)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 已经成长为学术中坚。2010 年, 他的新书《我在我们之中: 承认理论研究》出版。该书认为, 从黑格尔时代开始, 发展出了丰富的正义理念, 而一种规范的承认概念, 可以成为联系各种社会科学课题的桥梁。而法兰克福学派新生代即第四代代表人物福斯特 (Rainer Forst) 在批判理论的新发展上也透露出新的气息, 出版了新书《论证关系的批判: 政治的批判理论视角》。另外, 哲学人类学是近几年来德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与前几年取得的成绩相较, 2010 年的德国哲学人类学研究, 在学科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以及思想家的专题研究方面, 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突破。

观察 2010 年度的意大利哲学研究, 热点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意大利哲学家一贯重视的传统哲学研究, 许多哲学家依然致力于挖掘传统哲学的资源, 追寻现代思想的起源, 力图在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进行沟通。二是关注偶然性、不确定性的意义。对于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人们通常采取一种消极而排斥的态度, 但哲学家们认为应当重新认识其意义。他们发现, 正是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 增加了人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也为自我的改变提供了可能。三是关注“他者”的意义。他者, 既可以是他人, 也可以是其他文化。在全球化时代, 我与他人、本族文化与他族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因而如何对待他人和其他文化, 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哲学家们认为, 他者虽然常常具有消极的意义, 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 但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由于他者与我不同, 但正是从这种不同中自我才借以显示出来, 因而他者也有正面的意义, 这就是“平等对话”、“互相认识”、“缔结友谊”以及“相互推进”。

2010 年, 当代俄国哲学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就是霍鲁日 (С. С. Хоружий) 教授创立的协同人学 (Синергий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协同人学研究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 标志着协同人学发展的新阶段。俄罗斯哲学史研究, 苏联哲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领域都有一定进展。信息社会问题, 俄罗斯文化、文明及其命运的问题成为 2011 年

俄国哲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包括霍鲁日教授对西方人学的研究,此外法国、美国的哲学研究也有很多收获。在俄罗斯哲学家和思想家中间,施佩特、赫尔岑和托尔斯泰的思想成为讨论的重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俄罗斯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2010年,日本的哲学研究也是多种多样,我们按照西方哲学、日本哲学和中国哲学(或称中国思想文化)三个领域研究情况作简单的介绍。虽然日本哲学界的关心点遍布西方哲学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领域,“形而上学”、“马克思”等主题仍在不断讨论中,但研究的趋向的确是和现实相关,尤其是和伦理相关的问题,这些讨论和科学的发展、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人类自身的可能性、局限性等均有关系。日本哲学界的特点在于:第一,虽然偶然也有一些和中国哲学或东亚传统相关的内容,但主要的研究方向及其主题和西方哲学相关。第二,强调从哲学史角度、哲学家的个案出发作出研究。第三,近年热烈讨论的话题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问题。这和近年中国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反省比较一致。2010年的日本中国哲学研究一如既往,深入到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挖掘具体的问题,不作空洞的理论。就特点而言,一是对中国新出土文献的关注和考察仍是热点;二是从研究中国自身向中国周边展开,注意中国文化的展开,以及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与影响;三是对青年学者的培养日益重视。

报告仍然选择提供许多主要的文献目录,以方便读者的进一步研究。同时,按照规划每年介绍一些国外的主要的哲学系或研究单位。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哲学是面向客观真理和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性探索,因此研究哲学需要更加宽阔的眼界、更加宽广的胸怀。希望我们的报告能够有利于大家的思想探索和哲学研究。鉴于年度报告,缺少长时间的反思与琢磨,再限于我们的局限性,这个报告可能仍然有挂一漏万之嫌或差谬之处,敬请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韩震

2011年12月1日

英美哲学

一 语言哲学

2010 年国外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具体表现为: (1) 跨领域研究。无论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结合, 还是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结合, 都体现了哲学家们考察问题的多角度性。(2) 关联性研究。对于两种相关联的哲学理论, 应给予调和还是仅坚持其中一方, 哲学家们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3) 对困境的研究。当一个哲学理论遭遇到某种特殊的情形时, 其标准的解释模式可能会失效, 困境由此产生。随着近些年来语言哲学研究的日趋深入和广泛, 对于哲学理论中异常情况的研究和探讨才成为可能。2010 年英语世界对于语言哲学的研究论文多达百篇, 研究专著也有二十多部。其中, 哲学家们展开激烈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含糊性 (Vagueness)

2010 年研究含糊性问题的哲学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屡见不鲜。其中, 《综合》(Synthese) 期刊 2010 年 5 月第 1 期有一组文章专门讨论含糊性问题。关于含糊性问题一直存在着多种解释理论, 其中, 超赋值论 (supervaluationism)、多值逻辑以及语境论居于主导地位, 而目前侧重从认识论维度的分析也正日渐盛行。

盖夫曼 (Haim Gaifman) 研究含糊性的出发点是累计悖论 (sorites paradox) 产生的根源。虽然归纳原则被视为悖论产生的根源之一, 但他并没有抛弃这一原则, 而是提出了一个相对自然化的新主张: 限制合理地使用含糊性谓词的语境, 用语境逻辑 (contextual logic) 解释含糊性。^① 以

^① Robert van Rooij, "Introduction", *Synthese*, 174 (2010), p. 1.

等级化的形容词 (gradable adjectives) 为例, 主流哲学观点认为这类形容词应从个体间差异的程度方面进行分析, 这种差异的程度在萨松 (Galit Sassoon) 看来就是其所谓的测量理论 (measure theory)。但在盖夫曼看来, 这类形容词仅仅是一种谓词, 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语境依赖性。如果在一个语境中能适当地使用某个谓词 (如“高的”), 就意味着在此语境中存在着有意义的间距, 即能通过谓词“高的”区分众个体。如果在所有的语境中, 如“高的”这类谓词都能被适当地使用, 归纳原则就不能被视为错误的。依据语境逻辑, 盖夫曼认为不必设定“程度”等概念的存在, 我们也可以追溯“比……更……”这一容易导致含糊性的序列。^①

此外, 盖夫曼还详细区分了含糊性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宽容 (tolerance) 和边界含糊性 (borderline - vagueness)。宽容即谓词对于谓述对象发生的非常微小的变化具有不敏感性; 而边界含糊性则质疑给定谓词的边界明确与否, 即对于谓词对象应归属于这个谓词还是其否定形式, 我们并不十分清楚。^② 其中, 前者会导致累计悖论的产生, 后者是一种语义的不确定现象。虽然这两种现象在日常语言的含糊性实例中经常同时呈现, 但与其他哲学家不同, 盖夫曼认为二者虽有关联但并不彼此蕴涵。^③ 宽容是一种语境现象, 对累计悖论等现象可用语境逻辑进行解释。也就是说, 通过形式逻辑、语义学理论、演绎系统以及经典规则, 我们都可理解那些如“贫穷”、“步伐的大小”等含糊性语词的含义, 也允许这种含糊性的存在。这不是对微小差异的忽视, 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有意义的规则。而对于边界含糊性, 盖夫曼则认为这是一种可通过模态逻辑和语境论进行解释的高阶含糊性, “其出现并不仅仅在于语义上的不确定性, 而是说话者应认识到语词用法上的某些差异或分歧是合理的和可预见的”^④。在对含糊性的研究中, 盖夫曼力图为我们提供全新的哲学观念和分析技术。

由于对含糊性的认识论分析日渐盛行, 许多哲学家都把含糊性理解为不精确、不准确的知识。如威廉姆森 (Timothy Williamson) 的认知的误

① Robert van Rooij, “Introduction”, *Synthese*, 174 (2010), p. 2.

② Haim Gaifman, “Vagueness, tolerance and contextual logic”, *Synthese*, 174 (2010), p. 6.

③ Ibid. .

④ Ibid. , p. 7.

差幅度语义学, 哈尔彭 (Halpern) 的二维语义学, 以及中心语义学 (centered semantics)。他们对知识不确定性的关注点在于细微差别的非传递性和应如何对其进行说明。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威廉姆森在对含糊性作认识论分析时就视细微差别的非传递性为含糊性的主要根源, 并提出了认知的误差幅度语义学。认知的不确定性是“反身的、对称的, 但不是可传递的和欧几里得的”^①。这一思想虽具一定程度的解释力, 但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即内省原则 (principles of introspection) 的失效。对此, 哲学家们纷纷给予反驳。博奈 (Denis Bonnay)、伊戈 (Paul Égré) 和哈尔彭一致认为应该确保作为认知逻辑的反省原则的有效性, 具体而言, “现象上的细微差别通过指称具体的语境是可传递的”^②。而由于博奈和伊戈对知觉含义的理解比哈尔彭更宽泛, 即还包括对知觉的报告, 非传递性就被视为知觉知识的属性, 因而他们所指称的特定语境的界限是不明确的, 对不确定性提出的也是更直觉性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与威廉姆森又具有相似之处。博奈和伊戈在比较这三种对含糊性的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 对于高阶含糊性问题, 威廉姆森着重于对清晰度的说明, 即建立一种“……是清晰的”逻辑。与之相对, 博奈和伊戈侧重于说明“我知道……”。而哈尔彭则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 他的解释框架既包含知识的主观逻辑——坚持内省原则, 又包含关于清晰度的客观逻辑——内省原则未必一定有效, 因而他既是一位内在论者又是一位外在论者。^③

霍根 (Terry Horgan) 将其对含糊性的哲学研究称为“重估价值主义” (transvaluationism), 即对逻辑非一致性 (logical incoherence) 采取超越虚无主义的态度, 而当前流行的超赋值论即为这一观点的佐证。其中包括三个基本论断: 首先, 含糊性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逻辑非一致性, 包括含糊的语言、思想内容和含糊的对象、属性; 其次, 语言和思想上的含糊性 (即语义含糊性) 即便具有不一致的形式却是真实的现象, 是合理的, 必不可少的; 最后, 本体论上的含糊性 (即把含糊性作为对象、属性或

① Paul Égré, Denis Bonnay, “Vagueness, uncertainty and degrees of clarity”, *Synthese*, 174 (2010), p. 48.

② Ibid., p. 49.

③ Ibid., p. 48.

关系的特征) 却是不可能的。^① 威廉姆森把这种将逻辑非一致性归结于含糊性的观点称为“虚无主义”。正是这种指责使得霍根借用尼采的术语针锋相对地提出“重估价值主义”的主张。威廉姆森认为霍根的这种理论会使人们轻易地认为含糊性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本体论的含糊性还是语义学的含糊性。霍根则辩解道, 即便存在逻辑非一致性, 含糊性仍是真实、合理现象。对于本体论含糊性, “虽然真理与独立于心灵的实在相对应, 但它只是一种间接形式的对应, 并不蕴含着对含糊的对象和属性的本体论承诺”^②。即便在心灵中, 本体论含糊性也是不存在的。对于逻辑和语义含糊性, 霍根认为, 避免认识主义 (epistemicism) 和避免在一阶和高阶含糊性之间武断地作出严格的划分是处理此种含糊性除“重估价值主义”之外的补充之法。

(二) 语境敏感性与语义最低纲领主义

对语言哲学家来说, 任何一个语义理论只有考虑到语境敏感性这一情况才是完满的, 但对语境敏感性的本质及其在语义理论中所产生影响的大小或范围, 语义学家们却是争论纷纷。他们或者拒斥语境敏感性, 或者对语境敏感性进行严格的限制, 或者采取中间立场。

卡普兰 (Cappelen) 和利普尔 (Ernie Lepore) 于 2005 年出版了《不敏感的语义学》(*Insensitive Semantics: A Defense of Semantic Minimalism and Speech Act Pluralism*) 一书, 其目标直指各种形式的语境论, 目的在于对语境论者的立场釜底抽薪。他们设计了一系列试验以测试那些所谓的语境敏感表达式的语境敏感性, 这些测试包括: (1) 语境敏感性阻碍了跨语境间的间接报告; (2) 语境敏感性阻碍了集合摹状词; (3) 语境敏感性可通过跨语境间的非引用测试, 并认可真实语境转换的论证。未能通过测试的表达式都被认为实质上并不具有语境敏感性, 最后他们把语义学层面上的语境敏感性压缩到最低限度, 仅限于基本的具有明显索引性和指示性的语词, 这就是他们称之为基本列表 (Basic List) 的具有语境敏感性的语词表。他们认为那些过分强调语义理论中语境作用的语境论难以说明跨语境

① Terry Horgan, “Transvaluationism about Vagueness: a Progress Report”,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48 (2010), p. 68.

② Ibid. .

交流的普遍性。^①

自该书出版之后,各种温和语境论者、彻底语境论者纷纷加以驳斥。其中,维兰德(Nellie Wieland)认为,卡普兰和利普尔对于语境敏感性的试验恰好表明了语境敏感性所影响的范围其实比语义最低纲领主义者所承认的范围更广,即基本列表之外的表达式也同样能通过他们的测试。他指出,卡普兰和利普尔论证的关键在于,他们以“是红色的”这种语境论者常用的表达式为例,说明对他人话语的间接报告,即便转换新的语境,其成真条件依然存在。也就是说,这类表达式实质上并没有阻碍跨语境的间接报告,这种报告不但可能,而且语义最低限度的报告是这种报告的主要形式。在卡普兰和利普尔看来,正是表达式的字面意思奠定了说话者之间交流的基础,使跨语境间的间接报告得以可能。因而,语境论者所谓“是红色的”这类表达式其实是非语境敏感性的。他们试图以间接报告的语义最低限度性确保日常交流的可能性。对此,维兰德给予了指责,认为语义最低纲领主义的预设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间接报告的内容本身是非语境敏感的,而在语义上是最低限度的。

维兰德则认为语义最低纲领主义在说明日常跨语境的间接报告的实践中并不具有经验的充分性。他们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跨语境的间接报告是否具有确定性的真值,二是依据这个而不是那个语义学理论的交流是否可能。在实际的日常语言实践中,跨语境的间接报告若不能唤醒原始语境,交流就不会得以实现。这样,卡普兰和利普尔所谓的语义最低限度的间接报告便成为交流得以成功的真实障碍。在维兰德看来,他们所谓的间接报告仅仅像录音机一样传递或重构原始语境中的语音,而没有传递它们的含义。他们“混淆了间接语义报告和间接语音报告,因而也未能说明说话者为何时常获得前者而很少希望获得后者”^②。因此,对跨语境的间接报告的语义学分析并不能使大多数间接报告得到真正的理解。虽然“是红色的”与“明天”在他们的跨语境间接报告的测试中反映的语境敏感性有所不同,但“二者的不同并不在于它们在实质上是否具有语境敏

^① Nellie Wieland, “Context Sensitivity and Indirect Report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81 (2010), p. 40.

^② Ibid. .